

阎晋昌杂货店始末

阎理之

民国年间，我父亲阎炳文在临颍城内鼓楼西边路南租赁市房两间，开设杂货店一座，字号晋昌德，又名阎晋昌。从1912年（民国元年）开业，到1952年结束，历时40年。我自幼在店里长大，所有经营范围，商品购销与制作，人事变迁，自始至终，往事历历，记忆犹新，追叙如次，可作临颍商业史料之一例。

相传，我祖上是从山西迁来，清末，祖父阎明道是临颍城内拐角路东王义成杂货店的领事掌柜（经理）。该店是当时较大商号，王岗街设有分号。我父亲曾在店里当过学徒。

我生于1911年。当时我父亲把吃喜面时亲友送的鸡蛋、红糖、银首饰变卖了，又凑些钱作为资本，共60串钱。1912年租大布市街东端，衙门口路南（城东上坡高张三虎的）市房两间（出厦板门楼房）。开了座杂货店，面对衙门，商店林立，还有酒馆两三家，又在菜市上，位置适当。顾客多是官府书办、兵丁、衙役。城内东、南各街住户，东乡、南乡农民，经常顾客盈门，生意兴隆。

字号晋昌德，请本县书法家王耀先书写。但是门外挂三个招牌：一块长的，白底红字，上写“颍川阎晋昌杂货果品海味俱全；”一块短的上写：“颍川阎晋昌酱园；”另一个黑色葫芦形木板上刻“醋房”二字。标志着，既是一个货物

俱全的杂货铺（如现在的综合商店），又是做糕点的食品店和做咸菜、酱油、醋的酱园作坊。里边院子小，制作咸菜、酱油、醋的缸、锅等设备在南街家中，制成运到门市部销售。

商品种类繁多，采购多在许昌、漯河、周口等地。其中有：

日用品：香油、桐油、火柴、洋蜡、牙子碱、碱面、盐（民国初年有官盐店，一般商号不准经销，民国十五年以后，无官盐店，杂货店代销食盐）、酒、当时无瓶装酒，代销本地酒馆制的白酒，郾城产的料酒。

纸张类有：红、绿、黄、蓝、紫、黑等彩色纸，供纸扎匠扎阴宅、金童玉女等社火用，周口纸作坊产。绵纸，供糊窗户、订帐簿，写文约，抄书用，密县产。构皮纸，供纸扎匠糊纸房子用，婆坊糊油篓用，本地产。竹纸，供小学生描仿用，湖南产。薄连纸，供学生写大楷用，论斤卖，江西产。毛边纸供衙门、各机关写公文，江西产。连史纸、白有光、红绿有光纸，上海产。大红七官纸，写喜对，朱红纸，写春联。夹表纸，可做纸捻吸水烟用，包装红白糖果子等，湖南产。火纸，正方形，黄色，可作纸捻，包货物用，宛属各县产。白果纸，可供妇女做鞋帽，包装货物，湖南产，销量很大。

还有禀帖、单帖、全帖（8折）、龙凤大启帖，信封、信纸，八团对子，四扇屏，是贺花烛之喜的礼品。瓦金、镶对联用，泥金，写金字，印果签用，大斗红金，贴匾额大字用，罍、皮胶，木工用。

文具类：有毛笔，代售许昌申文兴，廖顺兴的毛笔。徽墨有：小方锭、“十二神”匾方锭，“太华秋”，“大国香”、圆锭“鲍乾元”。

糖有：台湾白糖、广东白糖、四川粗砂白、绵白糖。红糖有黑糖、松糖。冰糖分黄白两种。

调味品：八角大茴、广西产，胡椒、越南产，花椒、四川产，名为花川，也有本地花椒，小茴香、本地产。

海味有：海参、鱿鱼、鱼翅、海带、海蜇、虾米、银鱼、鹿角（也叫其干）、供酒席上使用。还有玉米、百合、白豆、木耳、黄花菜（也叫金针）、淮阳产。

探病人的礼品：闽姜（自制）、广橘饼、金钱橘、山楂糕（自制）桂圆、圆肉。这些都是冷门货，无一定行情，利润较厚。

干果类：核桃、大枣（新郑产）、白果（银杏）。

山货类：黑矾、农民上地用；白矾、炸油馍用；金灰、染灰布用；土粉、浆白衣服。砂锅、碗、筷子等。

迷信品：香、纸、黄表、锡箔。香是来自长葛、城东魏墩、城西湾陶；纸是烧纸，产江西，也有少量的时灰纸，本地有“河南不烧纸，饿死江西人”的俗语，把烧纸裁开，用特制工具名叫“纸朔”打上铜钱印，论斤卖；黄表产四川，以字号玉荣川的最多，焚烧敬神用；每刀96张，论张卖；锡箔产福建，由妇女们制成元宝，金银锭子形，挂到门市上出售。后来还有成盒的纸银元。还有鞭炮、蜡烛，都是供年节、农历初一，十五敬神、祭祖、办红白喜事用的，是杂货店经销商品的大宗。

果子糕点类：有鸡蛋糕、象牙糖、麻片、鸡骨糖、寸金糖、牛皮糖、芙蓉糕、撒起麻、桂花糕、卜荷糕、夹沙糕、薄脆、白皮点心、蜜食、兰花根、芋头酥、梅豆角等。这些果子装在纸匣里，用红绿纸封，上封刻版印刷金字字号座落

的果签，很美观。不论探新旧亲戚都是四封二斤。解放后，走新亲发展到8斤、10斤。民国十五年以后又制新式饼干，五纹饼、白鸡蛋糕。从许昌传来木制黄色点心匣，有蜡光纸签，装璜新颖。属上等馈赠礼品。另外有用纸包果子，或专包鸡蛋糕，称为懒包，看一般亲友用。

这些果子糕点，伙计徒弟们都能做。原料不外是：细面、白糖（不用黑糖）、香油、猪油、鸡蛋、芝麻、糖稀等，所以价格以白糖价为准、一斤果子一斤白糖价。

杂货店果子糕点旺季是年节，售货量大。特别是仲秋节，做月饼，每年要销几千斤。一般是提糖月饼，刻有圆形的木质月饼模，刻有字号，分四两、半斤重。还有枣泥月饼、豆沙月饼，南式白皮月饼，犹如点心。

酱园产品：主要是酱、酱油、醋、咸菜。从许昌请来技师郭俊章指导，由徒弟和我母亲跟着学，我也亲见，其制作方法也略知梗概。

酱是先用面蒸些死面馍，放到屋里麦秸窝里密闭门窗，捂一个时期，馍上长毛衣，拿出放到缸盆里，掺水和盐，伏里天在太阳下曝晒，即成，吃着带甜头，称为甜面酱。

酱油是用黄豆，在大锅里煮熟，捞出掺面粉，用大木框踩成块，切成小块，放到屋里麦秸窝里，密闭，捂一个时期，长了毛衣，拿出放到缸里，掺水和盐，在院里曝晒一个夏秋，装到布袋里，榨出的咸水，兑些糖色，即是酱油。所谓“秋油伏酱”。

咸菜：主要是芥疙瘩，洗净，放到缸里，撒盐，腌几个月兑糖色即成，名为“大头菜”。用刀敛了皮，切成小块，放到缸里腌后，揉上五香面，就是“五香大头菜”。

还有白萝卜、红萝卜腌法相同。酱笋（茺苳）、酱瓜（菜瓜）、腌后，放在酱里一个时期。把这些咸菜切碎，掺到一起出售，名为“十香菜”，还有韭花、蒜苔、香椿菜、酱黄瓜、辣椒、鹿角等，腌法相同。糖蒜，用糖、醋、盐腌。

辣椒酱，用水泡红辣椒、大豆、用小石磨拐磨后，掺盐成糊状，即成。芝麻酱、将芝麻在锅里炒后，在油磨上磨成糊状。不能掺水，越掺越稠，只能掺香油，越掺越稀。因此与香油同价。

豆腐乳，是点卤水磨的豆腐，切成小方块，放到笼里捂到长毛，放到罐里掺红曲和盐，盖住密闭一个时期即成。

豆腐干，工序繁杂，做过两次不做了。

醋，是用秫秫煮熟，名为“醋媒”。还要用大麦制曲，工序较繁，不很熟悉。

杂货店，商品繁多，生意零星，常年营业，深夜有人喊门买东西，板门上开有小门，供应顾主。腊月下半月年集，在门口摆摊，卖香纸鞭炮及日用品。除正月初一休息一天外，初二就有顾客上门。初五就正式开门营业。杂货商品贵在俱全，那种商品快卖完了，赶紧采购，所谓“要支住门市”。即现在说的“保证供应”。

民国20年前，市面流通货币，主要是清代遗留下的铜钱，圆形方孔，一面铸汉文，康熙通宝、乾隆通宝、道光通宝、咸丰通宝、光绪通宝等字样；一面铸满文。卖一天，从钱柜里倒出，徒弟们查钱，用细麻绳钱串串住，五百文为一贯儿，两贯儿一千文，叫一串，五串钱用粗麻绳捆为一捆，携带扛在肩上。另外有宣统、民国时期铜元，当十文的、二十文的。到民国十五年后有当五十文的。大宗买卖是银元，叫

现洋，重七钱二分、上有袁世凯像，俗称老袁头。解放后叫“钢洋”。到1931年以后，国民政府发行纸币，所谓中国、中央、交通、农民四大银行的纸币，称为“法币”，流通使用。银元逐渐减少，铜钱绝迹。通货膨胀，物价上涨，造成商业赚钱赔货现象。货卖出去，以同样钱数买不了原来货物那样多了。

杂货店赊账的很多，帐户都是熟人。看他随即能清帐，暂记在油漆的木水牌上，到还帐时擦去。看他是长期赊欠，记在日用流水帐上，然后过在分户底帐上。每年腊月在校上查找欠户，开帐条，着徒弟到城乡跑着要账，有好多要不到的痞子户。

我父亲因患病体弱，不愿自己经营，1926年，聘请杂货业的裴干民为领事掌柜，我家为财东。将货物、现金、家具一起折合银元一千元，作为资本，扩大经营，干了二年，裴掌柜另有他就，又聘请余盛长杂货店掌柜卢玺章，字子琢（河北修武人）为经理，继续经营。1931年又西迁10米，我亲戚卢家市房内，三间门面楼房，后边三间楼房，院落较大，南街家中腌咸菜、制酱油醋的缸和家具都挪去了。扩大经营，卢掌柜为人和气，善于经营，兼做批发生意，东乡瓦店、三家店的杂货贩都来采购货物，生意兴隆。卢掌柜1937年当过杂货业同业公会理事长，1939年当过县商会会长。

每年过罢春节要算帐分红。按旧商业规程本六人四分红，即财东分六成，人份分四成。算帐公式如下：

现存商品折价+现金+（外欠一欠外）-资本金 = 毛利。从毛利中抽出一部分作为给伙计、徒弟酬劳金，下余为红利，财东分六成，在份帐的掌柜们分四成。掌柜有一分二的、有一分的、有八厘的不等。往往在分红时我家再拿出

一成给伙计徒弟作酬劳金。

在份帐的掌柜，只分红、无身钱（年工资）无酬劳金；不在份帐的伙计（也称掌柜，又称把式）有身钱，酬劳金。徒弟有少量身钱和酬劳金。

1944年5月沦陷期间卖了许多日伪联合票，汪伪储备票（一油篓），抗日胜利后作废，拿货物换了很多废纸，损失很重。

抗战期中出军麦、支杂差、纳商业税、法币贬值、物价飞涨、赚钱赔货、亏损日重。

1942年，我父亲病故。卢掌柜说：“老字号交营业税、所得税、直接税等，比新字号重。”商量结果，把字号改为德顺恒。但是抗日胜利后，国民党为打内战，横征暴敛，赚的多，出的多，入不敷出，货架上货物逐渐减少，生意萧条。亲友们劝我说，不要干了。1949年，我和卢掌柜协商，把生意关闭歇业了。伙计们都回家了，卢掌柜携眷回老家修武去了。

店里只留些货底、货架、果子柜、咸菜、酱油、醋缸。1950年，由于党的保护工商业政策的贯彻执行，城内商业又繁荣起来。“船破还有三千钉。”我又凑些资金，采购货物，配着货底，让曾在店里当过学徒的我的三舅父一人经营，干到1952年，他的十二岁儿子患病夭折。伤心之极，无心经营，就歇业了。只交给我60元公债票，一些货架、果子柜、几条缸、挪到家中，40年的杂货店从此结束。

韩掌柜之死

我家杂货店一位伙计韩掌柜，杜曲南边韩庄人，二十七

八岁，小个、肌瘦人，很精明机警。1939年夏天，赴许昌采购货物，去不久，许昌杂货店福聚通来电报说：“韩掌柜被枪决，速来领尸”！噩耗传来，店里、家里、街坊都非常惊疑，他会犯啥法？怎么用“枪决”字眼？遂即派人赴许，回来一说，才知道是为有日本飞机空袭警报，人都向城外跑，韩掌柜也跟着跑到城外一块坟地里趴下来。有几个人说韩掌柜穿白衣裳给敌机指示目标，是“汉奸”，用手枪把他打死了。实际是他身上带有办货的银元几百元，被歹徒看见，便加以罪名，用枪打死，将银元劫走了。混乱之际，歹徒不知去向。只得认霉气，把尸体运回，为他办了个好埋殡，给他家属一笔抚慰金。韩掌柜家人通情达理，也没怨言，认为是命该如此。听说妻子已怀孕，尚有后代希望。

我父亲生平事迹

我父亲阎炳文字焕亭，生于1880年（清光绪六年）清末国子监生，粗通文墨，尝读《东周列国志》、《封神演义》《三国演义》、《隋唐演义》等旧小说。夜晚常与我讲历史故事。我五岁即教我“描红”，练习书法，研墨叠纸，无间寒暑，坚持督导七八年，并鼓励我学习绘画。

他社会经验丰富，善言谈，常调解街坊家务纠纷。为街邻亲友的婚丧红白事担任“总理”。早年本街火神庙设坛求雨，玩马子，被推为“乡老”。自任学东在火神庙设私塾，聘塾师，约学童上学。民国十八年被选为南街街长。正值蒋、冯、阎中原大战，临颍城被围12天，他不避艰险，支应兵差，后以征派繁重，托病辞职。旋又被选为东南街合并的成城镇副镇长，不久实行保甲制，被新联保主任代替。从此

照料家事、店务之余，种花养鱼，以娱晚年。每值岁末，资助贫困者度过年关。有一年，附近兴隆街王家失火，损失惨重，他主动送给他家谷子两装，度过困难。

不久，“七七”事变，大片国土沦陷，日机空袭警报频传，常以国事为忧，怕当亡国奴，忧虑成疾，卧床数月，心病难治，医药罔效，终于1942年正月十四日病故，寿终63岁。

1990年1月17日

临颍县手纺流动传习班

宋 铭 阁

1938年，日本侵占我华北大片地区，不断向黄河南岸派飞机轰炸。当时河南省建设厅已迁洛阳，洛阳天天都有日机扫射。在这种紧张的情况下，1939年建设厅通知各县派一名学员到洛阳建设厅手纺传习班学习机械纺纱。

传习班由建设厅派人主办，内有技师两人传授手纺技术。置备单脚足踏纺纱机10部，双脚足踏纺纱机10部，手摇纺纱机10部，弹花机五部，切花机五部，打线车五个。单脚足踏纺纱机有锭子15个，双脚足踏纺纱机有锭子20个，手摇机有锭子40个。比农村旧的纺花车只一个锭子快了几十倍，因此很受欢迎。各县学员在技师指导下，实际操作，学习了一个月结束。毕业后各回各县组织学习，传授技术。建设厅

在禹县建有手纺机制造厂，各县可前往购买。我县买单足踏纺纱机、双足踏纺纱机各四部，手摇纺纱机一部，弹花机、切花机各一部。在县长褚怀理、建设科长王文显的主持下，把全县划定了十几处，轮流学习，每处学习一个月。并在城内建有手纺机制造厂，制造各种纺纱机。学员学习后可自己购买。当时县长褚怀理不断到各传习处视查督导，甚为重视。学员学习情绪很高。每到一处民众都成群参观。西华县没有派人到省学习，没办学习班，因此也有来我县要求参加学习的。如七里仓有个叫何田的，学习后，自买机子一部，在家昼夜纺纱，干了几年，收益很大，家庭生活大有好转。我县得到好处的更多。还有安徽太和县人来我县学习，并购买机子的。可见人们对手纺机的改进是欢迎的。但当时为啥不能普遍发展呢？一个是机子价钱昂贵，一部机子40—60元，学员学习后，经济条件好的买得起，差的，想买没有力量，这是不能普遍发展的主要原因。再者是日本进攻中原，手纺机制造厂停办，因此，新生的手纺改进事业被扼杀了。

写于临颍县三家店乡高宗寨

1989年11月28日

清末民初临颖官办工农业机构

宋 铭 阁

据民国五年《临颖县志》载：“光绪三十一年县令周书麟设工艺局，开办费五、六百串，每月支钱八十串。设总办一人，技师一人，学徒七、八人。织毛巾、洋布、文锦被面等。宣统三年因地方不靖，养勇无款，官绅公议停办。经费归守望社”。

民国四年县长陈俊开办贫民工厂，内设织染科，用总办一人（后称厂长），技师一人，厂夫二人，学徒三十名，供给伙食，不准外出。织布机十五张，计划月产布三十匹。该厂宗旨救济贫民，使其获得织染技术。地址在城内南大街路西今南街学校地址。曹子万、田荃臣任过厂长。

1927年后改为民生工厂，移至城内小南街路西今城关医院。解放前，臧良弼、丁德宇任过厂长，技师李芳斋、翟子聘。学徒二十人，有织布机五张，毛巾机两张，资金数百元，买棉纱织成布匹和毛巾，盈利除维持学徒伙食外，余交县。

《县志》载：“在西关外路北（今备战路口东侧），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县令陈垣开办农林试验场，派南关阎法理充管理员，置地十余亩，周围筑墙，北部建大厅一所，四面出厦，门窗装玻璃，四周雕栏杆。中挖地窑，外筑月

台。甃砖井二，凿莲池二，凡外境异种植物，栽培其中，试其果与土质相宜否。宣统二年（1910年）属农务会，陈凝之为会长，阎法理为庶务。后李培之接充会长。民国二年停办。”

以后改为农业推广所的农场，耕地三十余亩，该所设主任一人、助理员一人，工人五名，牲畜两头，车马犁耙俱全。农场收入除用于种子饲料、工人伙食、工资外，余交县。

民国二十三年县政府设建设科，辖民生工厂和农业推广所。以上两个机构设置的目的是，主要是改进工农业生产技术，使全县工农业有所提高，有所发展。但事实上，对工农业生产工具没有改进，生产技术、产品质量也没有提高。工厂生产的布匹、毛巾并不新奇；农场没有培育出新品种，也没有农药、化肥，完全和农民耕作方法一样。二者根本没有起到指导工农业生产的作用。

为什么这些官办工农业机构起不到发展工农业的作用呢？主要原因是旧社会政治腐败，不重视科学。工农业大学培养出的知识分子也都在通都大邑工作，不愿到小县来。这些机构的负责人都是有权势绅士，他们不懂科学，徒拥虚名，尸位素餐。甚至贪污肥己，如贫民工厂厂长曹子万就是有名的大绅士，不懂工业，厂长田荇臣，克扣工徒伙食，贪污利润，吃喝嫖赌，怎会有心改进技术，以致引起工徒罢工。农业推广所主任刘东晨，也没有研究过农业，对选种、育种、防治病虫害，分析土壤等科学知识一无所有，如何能够负起改进农业的责任。因此这些机构有名无实，靡费公款，根本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写于临颍城东高宗寨，1989年11月28日

（作者宋铭阁，现年73岁，国家教师，已退休在家，民国年间任过临颍县政府职员。）

余庆长布行兴衰记

刘 容 宾

我祖父叫刘东升，字金品，外号刘罗锅，许昌县张潘北寨人。家贫穷，幼年到临颍城内聚兴布行当学徒，大约在清朝末年京汉铁路未通车时。当时临颍土布已有名声，因交通不便和战乱，土布只销在附近地区。土布也叫大布，四八布，面宽一尺二寸，四丈八尺长。

我祖父学生意出师后，便在城内拐角附近租了一间门面，挂牌“颍川余庆长布行”，这个牌子直用到1952年北街学校占去俺的房子和家具。那时每逢春节，都取回家放在老天爷、财神爷位旁像神一样供奉，58年大跃进才把它毁掉。

因为，我祖父做生意讲信誉，人老实，生意越做越好。铁路通了，有一个山西省人，在西安经商的客商，来到临颍，起先在街上随便买卖些土布，晚上住店，穿着也很寒酸。我祖父出于怜悯，让他住在行里，他看我爷可靠，便一封信运来七八千银元，交给行里，叫买小布，面宽九寸半，也称九五布。当时临颍不织这种布，便让织户改织九五布，直接销往西安，兰州等地。那里的客商也越来越多，生意也

越来越大，又在北街北头路东买了一处房子，生意便搬到北街那里。仍然是颍川余庆长布行招牌。

从前中国的富商多在山西省，据说是李自成进北京，把明朝贪官污吏的金银财宝全部没收，清朝入关后，义军带金银财宝走到山西省失落，所以山西省巨富大商多，他们结帮到全国各地做生意，也在各地建许多山西会馆，民国初年，临颍山西会馆拜殿失火烧毁，由我爷集资负责重建，即现在的县一高的教务处是原来的建筑。那条街还叫会馆街。

爷死后由我父亲刘怀字襄武接替经营，仍是余庆长布行，认为那是一个金字招牌，每年春节还放在老天爷，财神爷位旁供奉。西安兰州客商都相信这个字号，知道它最守信用，有时客商只用一封信将款汇来，不签合同，就买好布寄去。

随着帝国主义入侵，民族工业停止发展，所谓洋布洋纱逐渐代替土布土纱，有一个时期临颍土布是用洋纱织成，我小时穿的鞋是用帆布做成，那是从武汉买来的洋纱包皮。织户没本钱就先给钱或洋纱，然后慢慢扣回，因而行里和织布群众关系很好。但是无论如何土布是竞争不过洋布洋纱的，到抗战前临颍只剩我们余庆长布行一家了。

抗日战争时期，沿海主要工业城市被日寇占领，临颍土布又渐渐恢复，有位在西安经商的山西人叫张云伯，来到我家住二年，买土布运西安发了财，结果带来大批买布客人，楼上楼下全住满啦，每天卖布人把院子挤的水泄不通。当时临颍城内布行由一家增加到三四十家，的确繁荣了农村经济。

国民党部队需要土布做被服，便派员到临颍收购，命令

各布行为其收四八布，而客商收购的是九五布，织四八布的不多，转产四八布需要一个过程，得把织户织出的九五布收完了，才能转产四八布，国民党军代表不等，打了我父亲几个耳光，并把我家存的近万匹九五布没收。那时士绅金粹章是我家座上宾，耿凤亭与我家是世交，主张到洛阳省政府上告，在那个贪污成风的社会里，几乎花掉全部行店资金也没打赢，反而把我哥刘敬宾监禁起来，说违反军令要枪决。后经临颍一位黄团长讲情，才得释放不准再告。

开封沦陷，有个难民老郑，民国廿七年逃到临颍时只剩下二元七角钱，找到我父亲帮助他开了包子铺，起名就叫二七包子铺，他的儿子郑勤杰还认给我哥做干儿子，因他做的包子炒的菜味道好，一些头面人物都去吃，生意很好。县长褚怀理爱听京戏，临颍就成立个京剧团，为讨好上级，科长太太也要登台演唱。郑勤杰和他老婆也到剧团学戏，唱的不错，解放后成了许昌地区京剧团团长。我哥刘敬宾也学了几出戏登过台，他一登场，全场的戏装都是他出钱买的，唱后便送给剧团。

有一次抗日募捐，一般商人和有钱人家有捐几元的，有捐10几、20元的。捐后在台子边粘一个小红条“某某捐钱多少元”，我父亲却捐一百元，结果县城到处粘着“刘襄武捐洋一百元”。北街路两旁的排水沟是我家出钱修建的。县城里有一恶棍赵长喜，人称赵爷，他想找我父亲的麻烦，都替我父亲担心，父亲找到一个黑大汉说：“我不求你和赵长喜拼打，只要赵长喜在大街拦着我时，你对他说：“赵长喜你有理和刘掌柜到县衙说去！我便酬谢。”从此都知道刘襄武不怕赵长喜。

1944年日寇占领临颍，我家布行里仍有四五个客人买布，那时我才十三岁，刚上中学，不愿当亡国奴便随我哥和客商押运几十辆架子车货物，经襄县，叶县，方城到南阳。公路都被破坏，绕乡间小路走，遇见民团、汉奸得花买路钱，走十几天才到南阳，南阳是国民党占领，褚怀理是专员。从南阳到西安的公路才通，路窄坡陡，没客车，只有在超载的货车上坐人，常翻车山中，每人路费就得一两多黄金。到西安后，我进入河南同乡会办的西北中学上学，后又转宝鸡国立学校，免费管吃管穿。我哥在西安推销土布，由于他吃喝嫖赌，回到家时只剩一两八钱金子。

我县土绸分白绵绸，纆纆绸两种。是蚕茧取丝剩下的锅底；家蚕茧织的叫白绵绸；柞蚕茧织的叫纆纆绸。农村妇女用手撕撕，挑在竹杆上，用一个小锤捻成丝线，妇女都捻这种丝线，每人每天只能捻一二两线，杜曲乡马庄庙一带农民再织成绸子，非常结实耐穿。纆纆绸染成红色，远销到西安、西宁、兰州、西藏等地，藏民用他束腰罩衣，和尚做袈裟，在那里非常贵，每尺可卖一二块银元，再买回麝香、红花、马尾等。抗日战争时期有人跑这种买卖。抗日胜利后土布已无市场，临颍布行又只剩余庆长一家，只是买卖土绸，解放战争时我哥还在甘肃省夏河县（拉卜楞通往西藏要道）推销土绸，原打算去西藏，因藏民打仗没法去，土绸也没卖成好价钱，回来带的马尾，卖给张罗的。

新中国成立后，49年至51年，还有客商来买土绸，特别有一活佛住在我家买土绸。50年暑假我从开封高中回来，父亲让我到广州买颜料品红，到天津买洋黄染土绸，解放后本来只有我一家布行实际已成土绸行。因管帐先生贪污，父亲

将他开除，他便和司朝臣，姜盛甫组织了另外一家土绸行。

土绸是有季节性的，农忙时就没入织，没生意。父亲为了子女养成劳动习惯，闲着的人挣个伙食，便买四十二亩地耕种，土地改革划为地主。按土地改革法第四条规定：地主的工商业不没收，所以余庆长布行的财产保留，家中有四口人不分地。可是52年北街学校将余庆长布行的全部房子屋内家具占用了。至此，有近百年历史的颍川余庆长布行告终。

1990. 12. 16 .

革命路上第一步

——沙北县第三区首次征粮工作回忆片断

寇培烈

一九四七年底，人民解放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解放了河南大部地区。国民党军政人员纷纷挟财带眷抱头鼠窜，乡保长们也蛇蟄龟缩畏罪潜逃。当此新旧政权交替的夹缝时期，一些地方土顽乘机拉杆结伙，任意抢劫，为害乡里。为彻底拯救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以查镇才（山东人，政委兼区长）为首的沙北县第三区政府，迅速与以程广兴（纣城村人，现河南省民政厅工作）为首的地下工作组联系，进驻纣城，建立了村政权，很快稳定了局面，旋即掀起了如火如荼的土地改革运动，其势如燎原烈火，迅速在全区